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anyan and Erpai, Buddhism and Taoism

三言二拍 与佛道关系之研究

姜良存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三言二拍 与佛道关系之研究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anyan and Erpai,
Buddhism and Taoism

姜良存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言二拍与佛道关系之研究/姜良存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209-08765-0

I. ①三… II. ①姜…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明代②佛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9②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446 号

责任编辑:王 晶

三言二拍与佛道关系之研究

姜良存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240mm)

印 张 1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8765-0

定 价 37.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2)88194567

总序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青年者，学术之希望也。“青年学术文丛”即以汇聚青年、襄助学术为宗旨，以积累吾校青年俊彦之著述，展现人文社会科学之成绩为鹄的。

作为山东省重点高校，曲阜师范大学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校训，秉承“孔颜型范，春秋学统，海岱情怀，洙泗遗风”，数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众多精英人才及优秀师资，享誉海内。

“南沂西泗绕晴霞，北岱东蒙拥翠华。万里冠裳王者会，千年邹鲁圣人家。”岱岳之阳，洙泗之滨，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斯为黄帝诞生之地，少昊活动之墟，商奄旧壤，周公封国，素称人文荟萃之域，周礼尽在之邦。当春秋战国之际，天子失官，学术下移，私学兴起，诸子争鸣，九流十家，蔚为大观，此中华文化之轴心时代也。而此轴心时代之轴心人物，则鲁国之仲尼也。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上古文明之大成，端赖鲁国历史人文之得天独厚也。

遥想当年，夫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明易道，制作春秋；杏坛设教，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弟子三千，七十二贤，成儒家之集团，士阶层亦以此登上历史舞台，兹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演为中国思想文化之黄金时代。时人已赞其“大哉孔子”“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弟子更叹“天纵之圣”“自生民以来未之有”。秦汉以降，士大夫及庶民无不尊崇孔子之道，其影响垂两千余年，且远播海外诸国，沾溉后世，垂范千秋。近世史家柳翼谋谓：“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西哲雅斯贝斯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誉为人类思维范式的奠定者，良有以也。

孔子者，伟大教育家；曲阜，东方之圣地。立上庠于斯，其义深且大焉，

非特有功于一时一地，尤别具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大义也！曲阜师范大学建校迄今，庶乎一甲子矣。经数代曲国人之耕耘，今日之曲阜师大，已成师范教育之沃土，综合性之高等学府，拥有曲阜、日照两大校区，占地两千余亩，涵盖文、理、工、法等十大门类，名家荟萃，桃李芬芳，人文底蕴深厚，九州海外驰名。

然忆昔建校之时，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亿兆斯民，同心同德，戮力建设，气象一新。1955年，山东省师范专科学校建于泉城济南。翌年，举校迁圣地，更名曲阜师范学院，升为本科院校。长校者，高赞非先生也。高先生出郟城高氏，幼承庭训，及长，师事大儒黄冈熊十力与大儒桂林梁漱溟二先生，宅心仁厚，学养深邃。受命出任曲阜师院院长，筚路蓝缕，艰困万端，书“犹有洙泗遗风，更加众志成城”一联，勉励师生，奋力开拓，使曲园迅速崛起于教育界，其德其勋，永铭史册。尤可言者，高先生自建校伊始，即于孔子文化研究，颇属意焉。曲园之孔子研究，今日于学界占居一席之地，赖高先生开创之力也。戊午年杪，改革开放，国家兴，曲园亦随之振兴，文、史、哲、政、经、法、教、管、艺诸科，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数十年来，曲园之人文学术，扎根文化圣地，吸纳传统养分，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洙泗学人，僻处小邑，登三尺讲台，授业传道，退而伏案，执笔撰著，孜孜矻矻，未敢或怠，于学问亦三致其意焉。虽未得大都市之声华，然反得以沉潜学术，安心著述，此其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之谓乎！

学术之事，诚非同寻常之事也。梁任公有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欲观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王静安亦谓：“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国家且勿论焉，而学术之于大学，事业之基也；之于学人，立命之本也。夫子倡“为己之学”，后儒秉“知行合一”之教，华夏两千余年之人文学术史，群星璀璨，光耀千古，不逊泰西。然近代以来，重理轻文之风大扇，新世纪以来，商业大潮席卷而来，人文社科无用论，甚嚣尘上；人文学者之清贫，有目共睹。尤其青年学者，于学术念兹在兹，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思维活跃，惜乎其资历尚浅，负累甚大，困难与机遇并存，痛苦与快乐兼有，民间所谓“青椒”一族是也。虽甘心寂寞，清贫自守，怎奈“压力山大”何！若此，欲得学术繁荣，岂不是

痴人说梦耶？职是之故，纾困解难，助其一臂之力，走上学术之康庄大道，则学校主事者之所思所念也。有鉴于此，学校社科处积极谋划方案，多方筹集资金，设立“青年学术文丛”，以襄助青年学者专著之出版，推动我校人文社科学术之繁荣发展。

本文丛面向全校人文社科领域青年学者全面开放，凡符合条件之学者皆可自愿申报，学校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入选者由学校组织统一出版。自2013年始，每年拟出版一辑，每辑不超过10种。

综观当今之世，学术之发展繁荣，端在打破学科藩篱，开展学科对话，实现协同创新。然突破成规，谈何容易？必当审慎擘划，期以长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尺之台，起于累土。此“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计划，面向人文社科诸学科，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搭建不同学科交流之平台，其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之起点乎？其我校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繁荣之基础乎？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编委会

2013年7月

目 录

contents

总序 / 001

绪论 / 001

一、晚明宗教现状与社会思潮 / 001

二、三言二拍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现状 / 014

三、三言二拍与宗教关系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021

第一章 三言二拍对佛教思想的表现 / 023

第一节 三言二拍对因果报应思想的表现 / 023

一、因果报应思想的内涵 / 023

二、三言二拍中的因果报应方式 / 030

三、三言二拍中因果报应思想的特点 / 036

第二节 对轮回思想的表现 / 045

一、轮回思想的内容 / 045

二、三言二拍中轮回思想的表现 / 052

第三节 对地狱的表现 / 070

- 一、古代的冥界观念 / 070
- 二、地狱思想的传入及其中土化 / 072
- 三、三言二拍中的地狱信仰 / 078

第四节 对观音信仰的表现 / 097

- 一、观音形象的演变 / 097
- 二、观音信仰的表现 / 099

第二章 三言二拍所表现的道教信仰 / 113

第一节 对道教神仙思想的表现 / 115

- 一、对道教多神崇拜的表现 / 115
- 二、三言二拍中神仙思想的特点 / 131

第二节 对道教法术之表现 / 150

- 一、斋醮与青词 / 152
- 二、符箓 / 163
- 三、咒术 / 167
- 四、尸解 / 171
- 五、丹术 / 174
- 六、房中术 / 178
- 七、隐形变化之术 / 186
- 八、占卜术及其他法术 / 188

第三章 佛教、道教与三言二拍的文学表现 / 194

第一节 佛教、道教与三言二拍的题材选择 / 194

- 一、三言二拍中的佛教与道教题材 / 194
- 二、三言二拍中佛教、道教题材的成因 / 196

第二节 佛道伦理思想与三言二拍的教化意识 / 212

- 一、冯梦龙、凌濛初的教化思想 / 212
- 二、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思想与三言二拍教化手段的设定 / 216
- 三、佛教、道教伦理思想与三言二拍的教化内容 / 221

第三节 因果报应与三言二拍情节设定 / 240

一、以因果报应思想作为小说整体结构的框架 / 240

二、以因果报应思想作为情节转变的契机 / 241

三、因果报应对小说艺术性的削弱 / 242

第四节 佛教与三言二拍的文体构成 / 243

一、佛教激发了话本小说的产生 / 243

二、佛教影响了三言二拍文体的构成 / 246

第五节 道教存思与三言二拍的艺术想象 / 254

一、存思简论 / 254

二、道教存思与三言二拍的艺术想象 / 257

结语 / 264

参考文献 / 265

绪 论

一、晚明宗教现状与社会思潮

(一) 晚明佛教和道教发展状况及其社会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明代是这历史长河的转折点。经过唐宋两朝的鼎盛繁荣之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停滞阶段。作为封建社会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也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封建王朝的更替进入了缓慢发展的阶段。明代佛教和道教两种宗教在长期发展、变革中教义理论已日臻完善与成熟，两教的思想家虽有探索，但也难以突破前人的理论体系以做出更大的革新之举。

佛教和道教的宗派除了道教的全真教、正一教，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等继续存在及微弱发展外，明代没有出现新的宗派。表面上来看，明代佛教和道教进入了衰微期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实际情况却又复杂得多。明代佛教和道教虽然不像唐宋两朝那样繁荣昌盛，但它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面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

存在决定意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总要根植于一定的生存土壤，而这生存的土壤，也就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在明代王权至上、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达的环境中，佛教和道教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取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事实上，明代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与政府官方的宗教政策及各代帝王对宗教的态度密不可分。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后，对宗教采取利用、扶植与控制的政策，使宗教成为维护大明封建王朝的有力工具。洪武元年，龙虎山的正一派道士张天师到朝廷庆贺朱元璋的登基之喜，朱元璋封他为“真人”，正二品，世袭，

免去“天师”之号。此举不仅将道教领导置于皇权之下，也减少了神职人员的特权。同时，国家还在南京蒋山召集僧人开会，为各大寺院选派主持，举办法会，为国“祈福”。此后，连续几年“复用元年故事”。洪武六年，朱元璋又下诏，将唐宋以来的“记僧售牒”改为免费发给，并放宽僧人的活动范围。洪武十年，再次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经》《楞伽》三经，并且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此外，朱元璋自己还为《心经》作序。这样，利用皇帝的威严规定了僧徒的念经范围，而且对佛教经典所作的官方性质的阐释，也使后来的僧人对此不敢有所创新。洪武十五年，国家设置僧道衙门，授命僧道衙门来管理天下僧道，把佛教和道教的管理权收归到世俗的政府机构之中。对于僧道衙门，全国佛教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僧录司，置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全国道教的最高管理机构是道录司，设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神乐观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龙虎山正一真人一人（正二品），阁皂山、三茅山各灵官一人（正八品），太和山提点一人。“僧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①僧道录司的设置及其相关措施的实施，使得明朝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正式把行政权介入到宗教事务的管理中，从而使佛、道二教教徒的修行生活，不再游离于世俗之外，而是成为世俗社会的一部分。佛、道二教由神圣趋向世俗，明朝政府的宗教政策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把佛教、道教纳入中央集权的统一控制之下，朱元璋还采取措施严格教规教戒，正本清源，着手整顿宗教。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不得出家。”洪武二十八年，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②。为了促进度牒制度的实施效果，朱元璋还规定僧录司向全国各寺院颁布“周知板册”，用来核对僧人的身份，以防教外之人混入宗教，

① 张廷玉等·明史·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1817.

② 张廷玉等·明史·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1818.

名为净化宗教，实为对宗教的控制。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仔细规定僧尼的修行要求。其重要者、大者把僧人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其各有职责，各有归属，小者规定僧人的经忏价格及收入分配。榜文的颁布，表面看来是政府对佛教施加一些限制，实则是帮助佛教进行整顿，去淤除垢，净化佛教，从而使佛教能更好地为大明王朝服务。

朱元璋制定的宗教政策，对整个明朝宗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定下了基调，以后诸帝的宗教政策，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沿袭或修正。虽然明代的宗教政策把佛教和道教纳入了政府的控制之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但明代诸皇帝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热情，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佛教、道教的发展。

朱元璋对佛教与道教充满感情，虽然这感情并不清纯。朱元璋信仰道教，吃过丹药，相信丹药可致长寿。他年轻时曾出家为僧，即位后极力崇佛，抬高佛教地位。“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①明成祖比之朱元璋，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优待僧人，赞助佛事，参与佛经的编写和阐释活动，为汉地僧人广立传记，亲自撰写《神僧传》九卷。^②对藏族僧人大行封赏，以至于“永乐年间，不仅受封藏僧的人数远远超过洪武的时候，而且封予的职位也远远高过洪武年间”^③。明后期诸帝信佛的也不少，英宗正统时宦官“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其所修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第一丛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临幸，以故释教益炽”^④。景泰时期因崇信佛教，形成天下“男女出家累百千万，不耕不织，蚕食民间，营构寺宇，遍满京师，所费不可胜计”^⑤。武宗正德年间，“法王、佛子、禅师、国师之号，充满京师”^⑥。

① 张廷玉等. 明史·李仕鲁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988.

② 张廷玉等. 明史·艺文志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453.

③ 郭鹏. 明清佛教.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27.

④ 张廷玉等. 单于传. 明史: 第164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457.

⑤ 张廷玉等. 单于传. 明史: 第164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457.

⑥ 明史考证摭逸: 第42卷. 转引自郭鹏. 明清佛教.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34.

自朱元璋始，明朝历代帝王也信仰道教，对道教也有着特殊的感情。永乐皇帝自认为是真武大帝的化身，武宗自封为大庆法王，世宗自封为道教帝君。明代帝王崇信道教，广设斋醮。太祖有《御制玄教立成斋醮仪文序》，“敕礼部会僧道定拟释道科仪格式”^①。又亲制道教科仪乐章，亲自躬行祈祷斋戒。至世宗朝，崇道更甚。世宗沉溺斋醮，老而弥笃，“不斋则醮，月无虚日”。又笃信法术，喜食金丹，崇信道士。世宗朝恩宠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皆以方术得一品之恩，其他如段朝用、胡大顺、蓝道行、顾可学等数十辈，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进”，皆得恩宠。世宗崇道一生，最后也因服丹中毒而死。真是成也道教，败也道教。

由于历代帝王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宗教势力恩威并重的扶持，晚明佛教与道教势力发展壮大，在当时社会及其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无所不在的强大渗透力量。万历十八年，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的沈榜著有《宛署杂记》一书，是书描写了北京佛教和道教的空前盛况：“宛平一县，版图仅五十公里，而二氏之居，已五百七十余所。此五百七十余所之中，其徒凡几万千，而宛平土著之在宫者，曾不得及十人。嗟夫！吾不知浩荡之恩，二氏将何以报称耶？抑予因之而大有感焉。盖今天下二氏之居，莫盛于两都，莫极盛于北都；而宛平西山，实尤其极盛者也。”^②仅北京一地宗教势力尚且如此，全国又何以堪？马钧阳亦清醒的统计过明末佛、道二教的教徒数量，而且他认为释、道二教负面影响甚大，业已成为社会问题，于是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切中肯綮，直陈事实：“国制：僧道府各不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州，千一百四十五县，额该僧三万七千九十余。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万。共该五十余万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论之，该米二百六十余万石。足当京师一岁之用。况不耕不织，赋役不加。军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其几。创修寺观，遍于天下，自京师达之四方公私之财，用于僧道过半。乞严加禁约。”^③

① 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道藏：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

② 沈榜。宛署杂记：第19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237。

③ [明]郑晓。今言类编：第6卷。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53。

明代佛教与道教势力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全面的影响，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所以，明代宗教进入政治生活，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明末田艺衡就指出宗教参与政治的现象：“我朝祭祀赞礼者，太常寺之道士，奏乐者，神乐观之道士。”^①道士参加官方行为的祭祀活动，俨然如政府中公职人员，这在明代以前是没有的现象。明代由于对宗教人士的任用，许多神职人员占据政府部门，把持朝政，甚至有时官员的升降黜陟也以奉玄为进退，或以做青词的好坏为标准，以致世宗朝出现“青词宰相”的局面。《明史·袁炜传》就称：“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袁）炜为‘青词宰相’。”^②《喻世明言》卷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提到的宰相严嵩因“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斋醮，供奉青词，由此骤致贵显”，其实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而且，由于历代帝王的崇道奉佛，大规模地建寺观、度僧道、行斋醮、求仙药等事项，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无数的钱财，影响恶劣，到嘉靖时几乎到了社会“民穷财竭，士风渐离”的地步。这种局面从万历三十八年户部给事中孟成已在给皇上的折子中可见一斑，孟说：“今太仓库藏出浮于入，大司农方苦不支，兼以饥馑相望，边饷告急……乃荒远无益道院，以一黄冠羽流，轻三万金掷之，徒恣市井冒破之需，甚为无谓。”^③由于佞佛崇道造成社会经济的衰落，这种民不聊生的现实是造成百姓痛苦生活的根源，百姓对现实感到无望，又转向虚无的宗教世界寻找精神寄托。明代文学中宗教色彩浓烈，这也应该算是一个原因吧。

明末佛教与道教自身有违宗教伦理精神的发展也对社会民风民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末佛教与道教已由上层发展转向民间，民间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原本隐居山林或宫观庙宇的佛教、道教教徒不堪忍受修持的寂静与超脱，纷纷踏入尘世，关心世俗事物。一些平庸的教徒更是热衷于俗世的热闹，混迹于市井，出入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市民的家庭。释、道二教出现了种种不良迹象，教律松弛，许多僧道不守戒律，道德水准下降，

① 田艺衡·留青日札：第28卷“道士主礼乐”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19。

② 张廷玉等·袁炜传。明史：第193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5118。

③ 明神宗实录：第467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8802~8803。

素质低下，烧杀抢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势利、奸猾、无赖之徒充斥其间，僧人更甚于道士。对此，帝王、大臣，教内教外的众多人士都进行过抨击。明太祖曾言：“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①“迩年以来，踵佛道者，未见智人，致使轻属小人毁辱骂詈，有玷佛门。”^②永乐皇帝也说：“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有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化。”^③其实，这二位皇帝的认识还局限于明代前期，明后期，佛教道教的腐败程度在许多人眼中已不可忍睹。晚明谢肇淛直陈佛教与道教教徒的恶行，他说：“天下僧惟凤阳一郡，饮酒，食肉，娶妻，无别于凡民，而无差役之累。相传太祖汤沐地，以此优恤之也。至吾闽之邵武、汀州，僧道则皆公然蓄发，长育妻子矣。寺僧数百，惟当户者一人削发，以便于入公门，其它杂处四民之中，莫能辨也。”^④明末僧、道的败落与无耻，令高僧智旭也大发感慨：“今时丧心病狂无耻禅和，影响窃掠，听其言超佛祖之先，稽其行落狗彘之下。”^⑤丧心病狂的无耻僧人，大言不惭，超乎佛祖，行为堕落，猪狗不如，以至明代出现了“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的谚语。僧与道的腐败及其引起的民风民俗的恶化，激起有识之士的不满，许多官员多次上书要求革除时弊。宣德年间刑科给事中年富条陈时政时就明确指出：“近年军民之家，捕逃规免税徭，冒为僧道，累以万记，不织不耕，坐食温饱，或有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败伦伤化，莫此为甚。乞敕礼部，令各处寺观僧道未度者，悉遣复业，隐占者逮问还俗。”^⑥

佛教和道教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不断调整与适应社会民众的需要，加之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二者都有了大量的信仰民众及广泛的社会基础。至晚明，佛教与道教弥漫整个社会，佛教、道教思想融入人们的精神生活。尤

① 释鉴稽古略续集：第2卷·大正藏：第49册·中国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936上。

② 释鉴稽古略续集：第2卷·大正藏：第49册·中国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938中。

③ 明太宗实录：第128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592。

④ 谢肇淛·五杂俎：第8卷·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57。

⑤ 智旭·示象岩·灵峰藕益大师宗论：第2卷之一·舟山：普陀山紫竹禅林，2007：112。

⑥ 余继登·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185。

其对普通百姓来说，佛教与道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求得心灵的慰藉，摆脱今世的苦难，也可以祈求来世的幸福，解决现世的问题。因此，许多民众对佛、道二教持有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情结，并以沉浸于宗教之中为乐事，一时之间，社会宗教信仰的氛围浓厚。有的人观风望月、相卜降乩、念咒画符，运用法术达到祛病禳灾、长寿成仙的现实追求。有的人投身到佛教的怀抱，到寺院中礼佛听法，敬拜三宝，慷慨布施，捐款捐物，参与寺院的兴建、修理等。于是，“闻立恭作佛之善事，有施以阿之者，有诚然为生死而布德者，一时从者，如流之趋下。”^①还有的人痴迷于宗教信仰，敬神拜佛，浪费资财，不在乎生存是否有窘况。明代海瑞就曾指出：“江南喜修道事佛，甚至迷惑不返，糜财破产比比有之。”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民愚无知，上人莫为之禁，不行申明晓谕使然也。”^②谢肇淛也指出了明代佛教、道教的盛况及其对人们的精神影响，他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黄舍，嗥诵咒呗器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③

如果说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儒野老沉浸于释道尚可理解，而文化修养较高、对社会人生有真知灼见的文人学士深信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就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浅层表现了。沈德符曾说他从袁中郎那里得到《金瓶梅》：“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怱惠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④沈德符担心出版《金瓶梅》会“坏人心术”，自己受到报应，日后要接受地狱惩罚，因而没有听从马仲良答应书商出版《金瓶梅》的劝说。沈德符和马仲良是否是教徒姑且不说，但他们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改变了他们思维与认知方式，佛教也成为他们道德自律的砝码，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明末佛教的短暂复兴，佛教的宣传，加之国是日非，内困外忧，胸

① 朱元璋·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葛寅亮·金陵梵刹志：第3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63.

② 海瑞·备忘集：第5卷·中国台北：学海出版社，1970：821.

③ 谢肇淛·五杂俎：第8卷·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53.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词曲·金瓶梅·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584.

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纷纷转向佛教，从参禅学佛中寻求解脱，形成了明末居士佛教的兴盛。历史学家、宗教学家陈垣先生曾说过这种现象：“万历之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①晚明士人蒋德璟在《理学经纬十书序》中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②。佛门僧侣，官僚士绅，“声气相求，函盖相合”^③，呈现出一派火热的佛教信仰盛况。清代居士佛教学者彭际清所编《居士传》，也恰好说明了晚明居士佛教的隆盛。是书凡 56 卷，其中第三十七卷至五十三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而万历之前的仅 4 人，另有正传 67 人，附传 36 人，他们大都生活在万历至崇祯年间，且多为声名较著的文人学士。其中一些居士对佛教义理造诣较深，如曾经进士及第的袁宏道，写了《西方合论》，阐述禅净双修之要旨，显示念佛三昧之真义。是书后被收入《大正藏》，列入《净土十要》，一直到今天还是净土宗的权威论著。

（二）三教合流与明末社会思潮

自两汉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产生以来，二者不仅一直存在着如何与儒家思想相互共存的问题，而且它们之间也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不过就从整个历史来看，可以说释、道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释、道向儒家靠拢，三者之间相互融合与交流的过程。尤其唐宋以来，三教合流的趋势日益深入，至明代时三教合流更加发展，儒、释、道进一步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彼此融会贯通。三教合流成为明代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

明初朱元璋首开三教合一的先河。朱元璋年轻时出家当过和尚，为僧的经历使他谙悉佛教教理，明白佛教和道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④朱元璋认为释、道二教有助于维护封建统治，安定民心，因此朱

①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34。

② 蒋德璟·理学经纬十书序·明文海：第 22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2368。

③ 王元翰·凝翠集·与野愚僧书·丛书集成续编：第 117 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915。

④ 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道藏：第 9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